

人之卓越的丧失与制造平庸的教育

◆章 乐

摘 要 人之卓越就是实现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在现代条件下,它意味着人要超越低层次的需要,走向高层次的需要,即“自我超越”。人之卓越不是一种品质,而是实现活动。物质主义造成了卓越的扭曲,官僚体系束缚了对卓越的追求,相对主义带来了自我的封闭,民主政体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大众的平庸,这些都是造成人之卓越丧失的现代根源。让学生接受卓越的教育,学过卓越的生活,对他们的卓越表现给予承认,并培养他们苏格拉底式反思的品质是可能的教育出路。

关键词 人之卓越

一、何谓人之卓越

首先,人之卓越就是实现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在古希腊,卓越一词与德性(virtue)密切相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或者说卓越是使得一个事物状态好并使得其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例如,对于桌子来说,它的卓越就是能够很好实现桌子功能的品质。古希腊对于卓越的定义其实包含了两个要点,其一,卓越是表现得优秀;其二,判断卓越的标准在于事物本身。那对于人而言,究竟什么是人之卓越的体现呢?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生活,即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享乐的生活追求的是肉体的快乐,它是动物式的,因此它不可能是人之卓越的体现。沉思的生活针对的是人灵魂中最好的部分“努斯”。为什么说“努斯”是最好?“因为,努斯的实现活动最完美,最能够持续,最令人愉悦,最为自足,既有严肃性又除自身之外无目的,且拥有闲暇。”^[1]按理说这种生活应该是人之卓越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在充分肯定此种生活的同时又指出,由于此种生活具有半人半神的性质,虽然它是可实践的,但只有少数的哲学家能做到,对于大多数人只

能退而求其次,即政治的生活。这种生活与追求荣誉有关,不过因为它也含有逻各斯(理性),所以这种生活是第二好的,也是人之卓越的体现,而且它也是大多数人可以实践的生活。阿伦特在其《人的境况》一书中,更突出了政治的生活是人之卓越的体现。她认为,人有三项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是与人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即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活动。“工作是与人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制作人造世界的活动。“行动,是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性的人之境况”,即人在公共领域中展示人之为人的活动,它是人之卓越的体现。^[2]根据亚里士多德和阿伦特的论述,笔者认为,人之卓越就是实现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它既不体现为动物性的生理满足,也不体现为神性的绝对沉思,而是体现为人性的完满,当然这种完满既离不开理性的指引,也离不开公共领域中的实际行动。

其二,现代条件下,人之卓越意味着不断“自我超越”。在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之卓越时,还必须顾及时代背景,当时的雅典是一个城邦,不仅拥有自由民,还有大量的奴隶。由于奴隶从事着大量的生存

章乐/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南京 210097)

必需的“劳动”,才使得自由民彻底摆脱了“劳动”,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那种以生存为目的的活动不是人的目的,只有那种高层次的能够展示人的尊严的活动才是人的目的,才是人之卓越的体现。但是,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存而从事一定的“劳动”,甚至“劳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与人的其他活动紧密联系。这不是要否定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之卓越的论述,而是要对它作一个现代人的转换。在现代条件下,人之卓越应被理解为超越低层次的需要,走向高层次的需要,即“自我超越”。正如鲁洁教授所说的,人不是一个停留在实然状态的存在,而是一个能够不断从实然状态走向应然状态的存在。

其三,人之卓越离不开实现活动。这就是说人之卓越不是人的某种能力或者功能。因为能力和功能即使人不运用也是具有的,而卓越不同,人必须在运用的过程中才能证明其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卓越,我们是先使用了它们而后才能获得它们。“一个人的实现活动怎样,他的品质也就怎样”。^[4]他还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赛绝不会把荣誉奖励给最有力量但没有参加比赛的人,只会奖励给参加了比赛,且表现为最有力量的人。此外,实现活动还意味着“仅当一个人知道他要做的行为,并且出于意愿地、因其自身之故并且出于一种确定的品质而选择它时,这行为才是德性的”,^[5]或者说是卓越的。

二、人之卓越丧失的现代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中庸”之道,但是由于对人们“中庸”的功利性理解,造成了原本表示恰切的“中庸”偏离本初的意义,变成了一种不要张扬个性,不要与众不同的消极思想。虽然中国在经历“五四”运动之后,试图与传统的消极文化断绝关系,但是作为一种已经深入民族潜意识的东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去除,所以它常常还会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传统的消极文化的影响,人之卓越的丧失还有其现代根源。

其一,物质主义造成了人之卓越的异化。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然而人们却又陷入了物质主义的泥潭无法自拔。当然,人首先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人是物质的,脱离不了一定的物质生活。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

为,一般情况下,人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性需要”之后,才可能积极投身于“成长性需要”,为此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是必须的。然而,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今,人们不仅是在满足生存必需的物质需要,更是在不停满足“人为制造的需要”,简而言之,现代人患上了“物欲症”。阿伦特认为,我们的“地球异化”了,“世界异化”了,原来“劳动”、“工作”、“行动”的序列发生了错乱。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劳动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成天为着人为制造的生存性需要而奔波,而展示人之为人的“行动”却消失了。在“商业伦理”的推动下,大量广告也通过多种媒介形式不停息地给人们灌输着大量的消费信息,引诱着人们的消费冲动。面对着“人为制造的需要”,“劳动世界”和“商业伦理”,现代人对卓越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扭曲,它已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灵魂是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也不再是在公共领域中“行动”展示人之为人的尊严,而是占有多少物质,消费多少物质。

其二,官僚体系对追求卓越的束缚。长期生活在官僚体系下的人,已经习惯了按部就班,习惯了以服从命令而逃避作为人的责任——“平庸的恶”,所以才会出现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不让救护车通过,最终酿成惨剧的事件。鲍曼更深刻地分析了官僚体系带来的危害。他认为,由于现代组织内部不断精细化分工,组织中的每个人都仅仅是整个体系中的一个小部件,似乎每个个体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无关痛痒,并不能影响整个组织行为的结果,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行为的叠加最终酿成了大祸,并加剧了官僚体系在社会中的蔓延。此外,在官僚体系下,作为整体部件的个人无法直接预测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种“不置可否”的策略,使得自己的行为无须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然而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他们也失去了实现人之卓越的机会。可以说与官僚体系中的人打交道就等于与整个制度打交道,在这样的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往往失去了勒维纳斯所说的那种与他人“赤裸”的照面,失去了那种对“他人”无条件的责任,丧失追求人性的卓越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三,相对主义带来了自我的封闭。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打倒了上帝,在上帝死后,理性成为了新的上帝。面对着理性的极端形

式——科学主义的盛行,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力图破除理性的陈规,高扬人的创造。不过,这场反叛中,神秘莫测的“自我”取代了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对主义由此产生。不能说相对主义一无是处,不过,相对主义本身就隐藏着滑向虚无主义的极端倾向,从而导致自我的封闭,失去追求人之卓越的动力。因为在相对主义者看来,善恶没有绝对的区分,无论一个人信奉的价值如何,只要是其信奉的选择,就是好的选择,而且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对别人进行善恶的评价。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每个人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当然就不需要考虑其他的选择,从而导致了自我的封闭,失去了追求卓越的机会。所以布鲁姆说道,“由于相对主义的兴起抑制了人们培养和探索优秀生活的真正原动力。”^[5]

其四,民主政体带来了大众平庸。民主政体在现代人眼中可谓是最好的政体,笔者在这里也并不同意彻底否定民主政体,而是想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民主政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众的平庸。在民主政体中,除了民众之外不存在任何可以求助的合法权力机构,并且民主政体又是基于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原则,所以它彻底粉碎了反抗者的内在意志。“虽然民主制度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与其他任何一个人平等,平等人之集合却是难以对付的。如果所有的意见都是平等的,按照政治心理学推论,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应该占支配地位。……这就是真正危险的多数人的专制。这并不是那种多数人迫害少数人的暴政,而是由于不存在反主流原则的有效力量和优越感的缺乏,从而粉碎了少数派的反抗意志的一种暴政。”^[6]在这样的暴政下,人们失去了实现人之卓越的机会与力量。亚里士多德曾区分了三类政体,他认为,“其中最优秀的政体必定是由最优秀的人来治理的政体,在这样的政体中,某一人或某一家族或许在德性方面超过其他一切人,为了最值得选取的生活,一些人能够胜任统治,另一些人则能受治于人”^[7]。然而由于民主政体过度地强调程序的平等,因此,任何一个更具有德性的人都不会比其他人说话更算数。在这种政体下,一个人很难过起卓越的生活。此外,民主政体总是关心有用的事物,即关注效率,注意解决大众认为最紧迫的问题。虽然有用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需的,但是真正卓越的东西并不一定能用效率或是否有用来衡量。

三、制造平庸的教育及其超越

现代性的种种弊端造成了追求人之卓越的丧失,教育本应该发挥自己应有之义,对这一不良趋势提供相应的拉力,然而,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实然的倾向却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一,物质化的教育忽视了人之精神的健全。“不论人们如何定义教育,教育都有其不言自明的意义,那就是教育要使人成为人,教育要促进人的发展”。^[8]在唯经济主义的浪潮中,教育也丧失了它应有的批判与反思功能,反而是在推波助澜,与社会其他方面共同酿成了现代人的“物欲症”。为何即使在素质教育呼声不断的背景下,应试教育依然如火如荼。为何人们会说“减负”等于“加正”?为何课程改革后,即使教材变化很大,不仅关注学生的生活,而且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可是实践层面还是变化不大?为何教育部已经三令五申不准任何形式的补课,可是还会出现学生被带到军营补课的现象。其实,在这些现象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教育对物质利益的承诺。无论是教师、家长,还是学生都知道,通过应试教育可以实现代际流动。应试教育的成功,即高考的成功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人生的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可以考上名牌的大学,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可以赚得更多的收入。可谓一步成功步步成功,一步失败,步步失败。然而,近几年来,因为本科的扩招,研究生的扩招,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已经不能完全承诺学生可以获得物质利益,所以“读书无用论”又有抬头的趋势。笔者认为,在物质利益驱使下,教育中出现背离人性走向卓越初衷的情形。不能否认教育有其功利性的一面,即通过教育,学习知识与技能,为将来的谋生提供基础性的条件,但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使人的精神能够获得健全的发展,物质化的教育忽视了教育对人之精神健全的关注,使得教育走向了异化,也最终使得人之卓越变得扭曲。

其二,等级化的教育扼杀了人之卓越的可能。面对官僚体系的蔓延,学校也未能逃脱它的影响。从宏观层面看,近代以来的教育,逐渐沦落为国家的附庸,盲目地向学生灌输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当今全球化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国家“为了保证领土的完整和生存下去,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一些正式的教育

结构和采用了普通教育的方法来培养忠诚的人民。”^[9]在其笼罩下,现代的教育只向学生灌输着“盲目性忠诚”,而忽视了“开放性忠诚”(哈维贺斯特和纽卡顿语)。从微观层面看,现代社会的等级主义已经深深扎根于学校。一方面,学校中领导通常拥有最高的权力,他们能够决定学校的一切,教师和学生对于学校的各项决策实质上基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等级主义对他们毒害之深,而且还由于现在的教师和学生都受“身份焦虑”(德波顿语)的驱使而只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关注个人的得与失,对公共生活、公共利益毫无兴趣。这种现象不仅使得校园中等级主义不断蔓延,而且还对未来社会中等级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杜威所说,“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说,今日的学校生活就是未来社会生活的雏形,如果学校纵容了等级主义的蔓延,那么,未来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等级主义盛行的社会。笔者认为,等级化的教育,其实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由上级的教育领导制定教育目的、内容以及方式,下级的教师和学生只要按部就班的接受就行,这种教育剥夺了人之自由的选择,必然扼杀了实现人之卓越的可能性。

其三,知性化的教育排斥了人之卓越的实现。随着科学主义的蔓延,整个教育出现了知性化的趋势,其具体体现为“教育的知识化”,“教育的思维化”。虽然这样的教育有其价值,但是它绝不是完整的教育。因为完整的教育不仅要关注人理性的一面,而且要关注人非理性的一面,不仅要关注人知道了什么,而且要关注人有了怎样的生活实践。教育的知性化割裂了完整意义的人,排斥了人的情感,排斥了人的行动。人之卓越绝不体现为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人之卓越,而是体现在一个人的生活实践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知性化的教育排斥了人之卓越的实现。

既然实然的教育制造着平庸,那么应然的教育又该如何?首先,学校要意识到不是“教育卓越”(主谓短语)而是接受“卓越的教育”、过“卓越的生活”。由于知性的思维方式对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影响,我们一旦认为需要学生具有某种品质,就会按照知性德育的思路,告诉学生什么品质好,为什么该有这样的品质。这个环节固然有一定作用,但绝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和听觉、视觉不

一样,它是需要通过实现活动才能具有,而不是相反。赵汀阳也认为,任何道德问题都不是规范伦理学所谓的应该去做(ought to be)的问题,也不是可以还原为知识论的“是不是”(to be)的问题,而是“做不做”(to do)的问题,即只有在实现活动中才能真正涉及道德问题,形成品质。因此,德性的养成绝离不开相应的实现活动,要想学生具有追求卓越的品质,就必须让学生接受卓越的教育,学过卓越的生活。所谓“卓越的教育”,就是指,学校要以本真的教育,优秀的教育对待学生,而非以失真的,低劣的教育对待学生;在面对社会的平庸之时,学校要能坚守其精神高地责任,给学生树立榜样。所谓“卓越的生活”,就是要重视学校生活与未来生活的统一性,让学生在学校的生活中过起他们力所能及的卓越生活,能够参与学校中的公共生活,克服学校生活中的平庸。

其二,学校应该让学生的卓越表现获得承认。人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复数性”存在,“关系性”存在。按照亚里士多德和阿伦特的理解,人的“复数性”优先于人的个体性。因为人只有在别人的承认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实现自己的独特性。黑格尔也认为,“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内在压力,有助于建立一种保障自由的实践政治制度”。^[10]学校本是一个师生、生生互动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教师对学生的承认,学生对学生的承认,能够使学生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更有力量追求人之卓越。因此,学校应该试图建立一个相互承认的共同体。还要特别指出,承认不等同于表扬,它更强调从内心认同学生的做法,并从精神上支持学生,愿意与学生一起接受挑战。

其三,学校应该培养学生苏格拉底式反思的品质。人在某种程度与反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只有始终对一切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轻易相信某个想法就是最好的,才可能不被平庸所束缚,走向卓越。其实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有可能偏离理性精神本身,反思才是核心。从柏拉图为落魄的苏格拉底进行申辩,到启蒙运动把苏格拉底推向理性的顶峰,又遭到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批判,而其自身又对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反理性思潮带来的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其实整个过程中都包含着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反思精神。所以布鲁姆说,“苏格拉底是我们中的一员,他那谜一样的存在引导我们

去反思智者的本性”。^[1]其实,本真的教育也包含着反思的品质,因为本真的教育关注人的发展与超越,而这两者都离不开对实然的自我进行反思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走向应然的自我。从本质上讲,教育就应该教给学生这样的品质,让他们在离开学校教育之

后,依然能够进行自我的教育,实现人之卓越。

本文系教育部2010年度重大项目“时代精神与道德教育”(10JJD880010)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翁伟斌)

参考文献

- [1][3][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译序34.37.译序27.
- [2][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
- [5][6][11][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缪青,宋丽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7.267.286.
-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14.
- [8]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55.
- [9][美]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M].吴元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97.
- [10][德]阿克赛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9.

Loss of man's Virtue and Education Making Banality

Zhang Le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virtue is man's purpose. Under modern condition, it means that constantly transcend the low-level demands to high-level demands "self-transcendence". It is not a quality but to realize activity. Materialism causes the distortion of virtue; bureaucracy obstructs the pursuit of virtue; relativism brings the closing of self; democracy creates mediocrity in some degree. They are the modern reasons of the loss of virtue pursuit. Not only education provides the corresponding tension to this situation, but also it plays a role of this. Ought to see, letting students accept virtue education, learn to live virtue lives, recognize their virtue, and culture the quality of the Socratic reflection is the possible way of education.

Key words: virtue, man's virtue, loss of man's virtue, education

高等教育必须牢牢把握提高质量这一主题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11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于10月22日至24日在重庆隆重召开。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在论坛开幕式上从五个方面作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讲话。杜玉波指出,在我国教育事业全面步入“由大到强”的新阶段,高等教育必须牢牢把握提高质量这一主题,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根本任务和首要职责,把高端人才作为大学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把质量特色作为大学竞争取胜的发展主线,把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为大学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把学科交叉融合作为大学品质提升的战略选择,把产学研结合作为大学服务社会的必然要求。这既是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新特征的集中概括,也是实现高等学校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杜玉波强调,提高质量的核心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体现,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高等学校要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出发,把学校的各项工作最终落实到人才培养上来。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改革是提高质量的根本动力。其中,高考改革是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改革的关键环节,高校组织模式创新是改革新的着力点,试点学院是改革的有力抓手。实现内涵式发展是提高质量的基本要求。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和办学观,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健全保障,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提高质量的重要保证。建设好一所大学,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培养一流大师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按照“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提高质量的有效途径,教育改革发展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1-10-26